



中国 1931—1937

动荡下的希望

王旸 著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

对西安事变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南京之南軍、孫哲生、馮玉祥、陳立夫等首先，現
武政府之南軍、安汝沛、韓繼、王應春、孫蔚如、周
自齊、張學良等，而軍事委員會派員發生動亂。
南京要緊，平穩以後，全國安靖，公愛因心，崇
外，政策，能維持，而南京公愛，步驟緩急，可更徐
到，其主戰是急迫者，而南京公愛，步驟緩急，可更徐
子外，亦非急迫者，其急迫者，非心，是以目前
非日，亦非急迫者，非因國內以我國，堅持內戰，非自速
因此急危存亡之故，非本政府所擬，而公愛如，下擬定
一、雙方各派，以完其義務，南京公愛，如左，及一
抗日軍亦停止其境內，等候和平以解決。
二、由南京、西安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
通知全國各派各軍各界各選民參加外，本堂亦派代表
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派各軍各界各選民代表團員
及各界代表，在平穩發生問題，但基本原則，應早自提

抗日

征暫定在南京

实为解决当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

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趨衰微而

中国 1931—1937

动荡下的希望

王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 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王旸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098-2912-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日本—侵华—历史—研究—1931~1937 IV. ①K264.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4567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复 审: 韩冬梅

终 审: 汪晓军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334 千字

印 张: 24.7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912-7

定 价: 43.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写在前面的话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相信从官方、学界及民间将有热烈非凡的纪念活动。而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也必将“大量云集”。

而我用20年的时间（老实讲，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断断续续的）“磨叽”出的这部书，又将以何种“姿态”与“特色”乃至“价值”获得学界、读者的认同而不被淹没于“书海”之中呢？！

说到“姿态”，涉及的自然是因为要写这部书。这很容易回答。我是个曾经专业从事过抗日战争研究，并且持续对此热情不减的研究者。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大活动中，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再者，无论何种情况下，我的血液里，始终澎湃和燃烧着爱国主义那不息的激情和坚信中国必将走向民主、富强、文明的营火。这是我写作这部书的动机。另外，我想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你可以把这看作“追求”，也可以认为是“妄想”。没关系，读过这部书，你随便评价。而于我，这是认真的。

关于“特色”，当然是我要努力做到写出“让人读得懂、看得下去”的历史书。看过很多有关抗日战争的书，要么“过于严肃”，非专业人士很难读下去；要么“过于传奇”，吸引读者却离历史很远。于是，我想，写一部既“严肃”又能够让人读下去的书。书中那些档案资料可以为“严肃”作证，而学中文出身的我（偶尔不忘写写散文、随笔）用心让表述严谨而不失流

畅、清新而不“青涩”……我还是别说了，再说像“广告”，招人烦，还是读读吧。读了，你自有判断。

再说“价值”，恐怕真有“自我吹嘘”之嫌了。不过，有三点是我写这部书要努力做到的：一、关于1931—1937年的中国政局，在我或许“狭窄的”视野里，除了零碎的研究、叙述外，还没有一部完整阐述这一时期的书（如果我遗漏了，我道歉）；二、我力求更接近真相，更客观地写这段历史；三、我希望读到这部书的人，不后悔“浪费”了时间，并且有所收获。

关于这部书，就写这么多吧。

如果你足够细心，你有和我一样的习惯，看书先看前言，那么，你会发现，我的前言本身就是“与众不同”的。

王 暘

2014年夏

目录

序 论 1

第一章 突变与耻辱 14

一、日军开启侵华之旅 14

从“大陆政策”到日陆军省不断滋生的侵华冲动，从关东军试探性的冲突到九一八事变，继而占领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日军从1931年开始了武装侵略中国的进程。

二、“不抵抗”之下的退却与耻辱 35

区区两万关东军何以在几个月之内轻取东北？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逃往关内。“不抵抗”招致了严重后果。为什么不抵抗？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的应对，或许可以追寻到客观的真相。

三、日军进侵华北与华北政局的更迭 50

东北军的“不战而逃”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东北沦陷之后，日军马不停蹄地兵指热河与关内，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主政东北与华北的张学良黯然下野，华北政局更迭，中国国内陷于动荡之中。

四、美英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远东政策 70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打破了外国在华势力的既定格局。美英苏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采取“不承认”政策，英国采取“绥靖”政策，苏联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些政策究其实质不过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视事态的状况“等等、看看”，再说而已。

五、国民政府在日军进侵下的应对 80

“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这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

《塘沽协定》便是交涉的结果，这个结果便是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却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事实上对东北的放弃和进而出现的华北危局。而这一切是国民政府确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使然。

第二章 妥协与抵抗 91

一、抗日救亡与局部抗战 9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并不缺少血性。日军侵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时时涌动。东北抗日义勇军规模虽小，但抵抗的枪声遍燃东北全境；十九路军在上海让日军明白中国军人不是只会逃跑；而长城一战更彰显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从此响彻中华大地。

二、日军侵吞华北方针的确立与华北危局 110

如果说日军占领东北没有遭到西方列强与苏联的强

硬反对的话,那么侵吞华北便不得不“小心谨慎”,因为与日本逐步形成的独占东北的局面不同,华北却是列强“利益均沾”之地。于是,日军通过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达到“不战而得”之目的。中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三、英美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 125

从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其间,英美两国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虽然未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但与中国的联系多了起来。毕竟,日本对他们底线的冲击与在华的巨大利益是他们不能不介意的。

四、国民政府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 138

在得不到美英有力支持、自认为自身力量不足以与日抗争、国内又处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试图依靠外交政策,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广田外交”开展中央谈判与陆军悍然逼签“现地协定”并举,交替进行侵华的行为,打碎了中国政府试图改善中日关系的梦幻,使其由对日妥协而渐趋强硬与抗争。

五、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 147

日军对华北采取的是有别于东北的又一套侵略方针。“华北自治运动”即是这一方针的表现。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与中央军撤出华北。素来与国民政府抗衡的地方实力派被推到了主政华北的位置,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沿。日军计谋实现了,但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地方实力派也是中国人!

第三章 苦撑与蓄力 160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继续深化 160

1935年底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而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如日本的初衷。这些情况迫使日本再次调整侵略华北的政策。“广田三原则”的推行与实施，毫无遮掩地显示其独立华北及中国的野心。

二、宋哲元集团在日军侵压下的妥协与抗争 170

冀察政权成立的背景有妥协的成分，其后也曾有妥协的举动，但这并不等于这个政权被日本利用或为日本左右。实践恰恰证明，这个政权不仅没有陷于对日妥协，而是在不断地努力摆脱困境，走上抗战之路。

三、中日就华北问题的交涉 184

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底日本与国民政府围绕华北问题展开了谈判。这是日本妄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种阴谋策略，也是一场占有与反占有、阴谋与反阴谋之争。国民政府在周旋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种种无理要求。

四、两广事件与宁粤纷争的结束 201

国民政府虽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实现了所谓的“统一”，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地方实力派拥兵一方，各自为政，国民政府煞费苦心，逐一收抚。直至1936年的两广事件，才算结束了地方实力派与国

民党中央由来已久的纷争，基本实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统一。

五、增强国力之举 218

东北丢了，华北危机……日军灭亡中国的野心在太阳旗下张扬。不是不想打，而是知道实力不如人。况且，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还有“国家统一”的课题待解。在用妥协换取了日军武装侵略的步伐暂停后，便是用各种手段“清除”反对势力。同时，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积蓄力量，为对日战争作准备。

第四章 希望与转折 245

一、共产党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45

当日本的扩张战略威胁到中、苏双方的利益时，中苏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由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中苏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共关系。而对于国共两党，不管有怎样的“血海深仇”，经历过怎样的“兵戈相见”；面对外敌的进侵，兄弟毕竟是兄弟。为了家园，党派之争让位于民族兴亡。携手抗敌是应有之果。而为了这个结果，国共双方都在努力。

二、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 256

共产党人是中国的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合中国各种力量的最佳策略。也许从举起抗日大旗的那刻起，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三、地方实力派与国内的团结统一 266

作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第三种势力，地方实力派是一支不允忽视的力量。其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虽参与“剿共”，虽与国民党中央争权抗衡，但在民族大义下，他们选择了“联共抗日”与“中央化”。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276

在民族危亡的刺激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影响下，以北平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股浪潮推动着国内各党派与阶层在抗日大旗下聚结。

五、西安事变与一致对外 284

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内政局转折的变点，这毋庸置疑。其重要性其实还可以延伸到：全国各党派阶层的空前团结，抗日成为中国唯一目标；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被确认；中日之间的全面对抗已箭在弦上。

六、冀察政权“中央化” 294

作为与日军直接对话的前沿，冀察政权担负着“御侮折冲”之重任。既想保住自身的地盘，又不甘于日军的侵侮，只好在与国民政府的争长论短中维护自身利益，又在与日本的“虚与委蛇”中拖延其进侵的步伐。但当中国国内逐步趋向团结对外时，冀察政权选择了“中央化”。

第五章 侵略与抵抗 307

一、大战前夕美英苏的对华政策 308

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图抗日的新局面。同时，日本也在密谋与实施着新的侵华步骤。而中国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作出的努力不断改变着“懦弱”与“不抵抗”的形象。对此，美、英、苏各国在对华问题上也相应表现出积极的倾向。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准备 316

西安事变让和平代替了内战，团结代替了分裂。中国政局结束动荡，走向新的开端。为应对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开始了抗战的准备工作。

三、日本确立新的侵华方针：“对华一击论” 329

1936年底中国爆发的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为“决定命运”的两件事。它不但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的失败，也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统治集团被迫自1937年初开始，进行“对华再认识”，再次调整对华政策。最终，“对华一击论”成为新的侵华方针。

四、宋哲元集团与卢沟桥抗战 339

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下，冀察政权也在做着抗日准备。当卢沟桥事变作为日军侵华的借口发生后，二十九军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五、“最后关头”与全民抗战 358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蒋介石“庐山谈话”接踵而来。这是彰显中华民族不屈气节、不谓强暴的谈话。从此，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守土抗战，一场悲壮慷慨的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展开。

结 语 372

主要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2

序 论

1931—1937年的中国政局，是纷乱而动荡的。

1931—1937年的中国政局，也是凝聚力量与滋生希望的。

1931—1937年，是中国由纷争到御侮的重要时期。它的前面，是军阀混战，各自为政，国家积弱，民不聊生；它的后面，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由动荡纷争到团结御侮，在六年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浴火重生；那些走向未来光明与胜利的希望又是怎样顽强地滋生起来的。这里，有太多的事、太多的人可讲（每件事、每个人都可以用长长的文字来叙述）。用一部书写这段历史或许反映不了它的纷繁杂乱，只能把那些最重要的历史线索与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做一分镜式的描述，知道在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日本在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何以没有燃起全面侵华战争，以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大陆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这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里，日本是如何由东北而深入到对华北的侵略，继而燃起全面侵华的战火？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偶然事件还是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方针的必然？在日本步步深入的侵华过程中，中国国内又是如何由分裂而走向团结统一的？中国不同政党、阶级、阶层是如何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捐弃前嫌、携手同存的？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件是怎样的态度？一句话，那场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悲壮慷慨、英勇无畏的抗

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

这是本书要写的。

这是中国历史要记录的。

这也是你、我、所有的中国人要铭记的。

一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阴谋由来已久，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了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了更为详细的侵略扩张纲领。奏折中说：“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虑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

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①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田中奏折》所体现的是日本征服世界、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而在如何征服和侵略中国问题上，奏折中的表述极为清晰：第一步，先用“强权（武力）”占据满蒙，将此建成巩固的日本占领区。第二步，以满蒙为根据点，用“贸易”（即经济侵略）的方式渐向中国其他地区推进，逐步扩张日本的权益，并最终攫取“全支那之利源”。

根据这一侵略计划与步骤，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东方会议后，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当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企图首先把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在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内乱重叠的情况下，日本于1931年首先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至此，日本开始了对中国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不断扩大规模与推进占领地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即按其“新大陆政策”预定的侵略步骤向中国内地扩张。日本首先选准了与东北毗邻的华北。华北不仅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理位置，而且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若占有华北，日本灭亡全中国的企图便等于推进了一大步。因而日本在占领东北后，便迫不及待地将矛头指向华北。囿于国际社会的掣肘，中国人民的反抗，自身国力的不足与巩固东北占领区的需要，以及新大陆政策所规定的“经济侵略”的方式，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再以武力征

① 南京《时事日报》第1卷第3期，1929年2月。

服为主，而改以武力威胁作后盾，通过外交讹诈与“政治谋略”的手法逐步侵吞华北。

日本侵略华北的所谓“政治谋略”手段，是试图通过“华北自治”（即将国民党政权和中央系势力排除出华北，建立受日本指使的亲日的地方政权）的方法达到对中国华北的控制，实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为此，日军制定了分离华北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要求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华北，使华北政权陷入真空状态，为达到这一层目的，日军在华北制造了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第二步，选择傀儡对象，实行由日本军人操纵的自治，日本为此制造了大大小小几十件所谓的“自治事件”，最终出现了一个冀东伪自治政府与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三步，全面压迫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指导地位。为此，日本与国民政府进行了长达一年余的关于华北问题的交涉。为了夺取华北，在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采用了除武力之外的各种阴谋手段。如：“广田外交”开展中央谈判，诱使国民政府实行“亲日外交”与陆军悍然逼签现地协定，压迫地方当局屈服同时并举的策略，两者默契配合，交替推进对华北的侵略；以“分离华北”为重点，企求朝着“分治”和全面控制中国的方面推进；从反对“以夷制夷”，阻止国民政府靠近英美，转为以“共同防共”为口号，拉拢中国“反对苏联，依附日本”；从“广田外交”到“佐藤外交”——失败后，日本陆军中“对华一击论”抬头，并最终在近卫内阁时确定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最后方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占有与掠夺华北，继而图谋全中国的目的。当日本制造的“华北自治运动”遭到国民政府明的反对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暗的抵制；当国民政府以“拖”的方式同日本进行调整邦交的谈判，而又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影响下中断了与日方的谈判；当中国国内由内战而和平，由分裂而团结局面出现时，日本欲用政治谋略夺取华北不成，便终于又走到了武力征服的老路，“对华一击论”被确定为侵略华北的国策。这样，七七事变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却又是那么必然地发生了。而由七七事变引发的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既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系列侵华阴谋的归结与高潮；更是中国内政由纷争到团结，一致对外，不甘欺辱的结果。